



上海外贸史话

上海人民出版社

9

上海外贸史话

《上海外贸史话》编写组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外贸史话

《上海外贸史话》编写组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十二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125 字数 119,000

1976年9月第1版 1976年9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4171·68 定价: 0.36元

前 言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我们编写这本《上海外贸史话》，试图通过几个片断，大体上反映出上海对外贸易的历史变迁，特别是旧上海半殖民地对外贸易的概况。

“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伟大的中华民族，用自己的劳动和智慧，为人类社会的进步，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早在古代，中国人民已经和外国人民进行了经济和文化交流。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中国和世界各国的贸易联系不断扩大，友好往来不断增加，对双方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有着重大而广泛的影响。

上海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成为一个对外贸易城市的。这标志着我国东南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开发，海上交通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我国和世界各国交往的进一步增进。自宋代开始，历经元、明，直到清代鸦片战争以前的七百多年时间里，上海是在我国享有主权的情况下，与其他国家和人民之间进行了友好贸易往来的。

但是，这种情况到了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起了很大的变化。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使封建的中国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毛主席指出：“帝国主义列强根据不平等条约，控制了我国一切重要的通商口岸，并

把许多通商口岸划出一部分土地作为它们直接管理的租界。它们控制了中国的海关和对外贸易，控制了中国的交通事业(海上的、陆上的、内河的和空中的)。因此它们便能够大量地推销它们的商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工业品的市场，同时又使中国的农业生产服从于帝国主义的需要。”(《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根据丧权辱国的中英《南京条约》，上海自一八四三年起被辟为通商口岸。此后不久，旧中国的对外贸易，就有百分之五十以上在上海进行。帝国主义通过这条渠道，对我国进行疯狂的经济侵略。帝国主义凭借它强加于中国人民头上的不平等条约，攫取了向我国倾销商品、掠夺原料和输出资本等一系列特权。帝国主义不仅强迫我国开放所谓通商口岸，并在各个口岸开设洋行、银行，发行钞票；还操纵了同对外贸易有关的商检、保险、航运、码头、仓库等部门，完全控制了海关。就这样，他们全部掌握了旧上海的经济命脉。帝国主义同我国历届反动政府相勾结，凭借种种特权，低价掠夺我国的农副产品和矿产原料，高价向我国倾销工业品，用不等价交换来攫取巨额利润。

旧中国的对外贸易长期大量入超，国民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连粮食、棉花等生活必需品也要大量进口。旧中国的对外贸易，成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吮吸中国人民血液的孔道。正如伟大革命导师马克思所指出的：“当我们将自己的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因为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很有体面的样

子，而一到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帝国主义者通过经济侵略和掠夺所构成的庞大剥削网，向我国劳动人民伸出了一条条吸血管。

“一唱雄鸡天下白”。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我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终于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华民族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我国对外贸易的性质，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解放以来，尤其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上海广大外贸职工，在党的领导下，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抓革命，促生产，上海的对外贸易出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一九七四年出口贸易比一九五〇年增长十二倍多，比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九六五年增长了近二倍。进出口的商品结构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进口物资中生产资料所占的比重逐年增加，出口物资中工业品的出口比重迅速增长，农土特产的出口比重相应下降。目前上海口岸已和世界上一百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已有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我国在贸易往来中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贸易通五洲，朋友遍天下”，这就是今天的社会主义新上海对外贸易状况的生动写照。

这本《史话》，通过对一些历史事件和有关资料的介绍和剖析，从不同的侧面揭露了当年帝国主义穷凶极恶地通过所谓通商或贸易渠道来掠夺我国的丰富资源和剥削我国人民的情形，反映了我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不屈不挠地

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进行坚决的斗争。我们希望，这样做能有助于广大读者了解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历史，从而激励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个纲，始终坚持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继续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搞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决心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

限于我们的水平，本书的取材和叙述一定有不少缺点，甚至错误之处，热忱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

目 录

- 一、古代中国和早期上海的对外贸易····· 1
- 二、罪恶的鸦片贸易·····16
- 三、血迹斑斑侵华图画中的怡和洋行·····37
- 四、外国侵略者控制下的上海海关·····62
- 五、扼住中国金融财政咽喉的帝国主义在沪银行·····81
- 六、老沙皇魔掌南伸·····97
- 七、日帝铁蹄下的中国蚕丝业····· 116
- 八、旧上海美货成灾····· 137
- 九、官僚买办企业扬子建业公司····· 154
- 十、崭新的、社会主义的对外贸易····· 168

一、古代中国和早期上海的对外贸易

古代中国的对外贸易

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的民族，几千年前就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我国对外贸易的历史起源很早。但由于那时生产水平不高，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国内消费，因此在整个经济生活中，对外贸易不占重要地位。当时的对外贸易，掌握在统治阶级的手里，主要是为满足他们对奢侈品和消费品的需要服务的。

根据最早的历史记载，公元前十一世纪我国奴隶社会时期的周成王年间，南方有一个叫越裳氏的国家，曾派使者远涉险阻，带来当地物品和周朝交换货物，并送来白雉与象。周朝有所谓“内服”、“外服”的封爵。封在外服的是正式的国家。当时周朝与这些国家间的通商交易，有“玺节”为证明，经“司关”核验后才能进行，这实际上也含有对外贸易的性质。在我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有了进一步发展。约在公元前四、五世纪，中国已与希腊发生了贸易关系。希腊古书中提到的“塞勒斯”指的就是我国，意思是丝国。据记载，公元前四二五年至三七五年间，从古代巴比伦人所占之爱瑟洛到达中国南海一带，已有贸易关系，可见我国的海上贸易

也早就开始了。西汉时期番禺已经是对外贸易的都会，不少外商来此贸易。

“千古一帝”秦始皇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在我国历史上起了重要的进步作用。当时曾设置了叫做“典客”的官员，是九卿之一，掌管对外事务。杰出的汉武帝，继承了秦始皇的法家路线，对我国历史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汉武帝还派遣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促进了东西方的文化经济交流。著名的“丝绸之路”，就是在这时期逐渐形成起来的。这以后，“殊方异物，四面而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张骞等从西域移植回来的很多植物，后来就成为我国农副产品的品种，例如芝麻、蚕豆、苜蓿、黄瓜、石榴、葡萄、菠菜、大蒜等，有的已发展成为上海口岸的传统出口商品。中国的海上贸易，在西汉时也已经具有相当规模，远航商船自广东海岸出发，曾到达印度南部进行贸易。汉武帝还曾派人携带黄金和丝织品出海贸易，购求明珠、奇石、异物等。

贯穿我国历史两千多年的儒法斗争，深刻地影响着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深刻地影响着我国的对外关系。孟轲曾经公然宣扬，周朝的先王被外族侵略，献上皮裘和丝绸，不行，再献好狗名马，还是不行，又献珍珠宝玉，侵略仍然没有停止，最后把土地也让给侵略者。^①这就是孔孟之徒林彪奉为座右铭的“小国师大国”的儒家投降卖国路线。汉武帝刘彻是一个杰出的法家代表人物，面对匈奴奴隶主的侵扰，坚持抗战路线，和反动儒生们鼓吹的“约结和亲”、“与

① 《孟子·梁惠王下》。

之厚利”的谬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在对外政策上，一方面反抗匈奴奴隶主的战争掠夺，给入侵者以沉重的打击；另一方面，主动通西域，沟通汉朝与西域各族的友好联系，促进彼此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然而，汉武帝死后，他所执行的法家路线又遭到反动保守势力的反扑。公元前八一年（昭帝始元六年）召开的盐铁会议一场大论战，也涉及到对外政策与对外经济联系。那些贤良、文学打出“仁义”、“道德”的旗号，叫嚷“偃兵休士、厚币结和”，攻击汉武帝“废道德而任兵革”，反对汉武帝的抗战主张。他们明目张胆地攻击通西域，叫嚣“张骞通殊远，纳无用，府库之藏流于外国”。著名法家桑弘羊和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勇敢地捍卫汉武帝的抗战路线。他高度评价通西域，认为汉武帝“功勋粲然，著于海内”。在对外贸易方面，桑弘羊提出“制其有余，调其不足”、“农商交易，以利本末”等主张，并且说，“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外泄也。异物内流则国用饶，利不外泄则民用给矣”。西汉时严禁铁器、铜钱出口，主要是为了防止匈奴奴隶主改铸兵器，而对黄金、丝织品及一些手工业制品则允许出口，用来换取骡、马、骆驼、兽皮、璧玉等等。可以看出，当时的法家代表人物已经有意识地利用对外贸易为封建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服务了。

唐朝初期，我国北方突厥奴隶制游牧民族统治集团经常入侵，唐太宗李世民坚决反对李渊等准备迁都逃跑的政策，并于公元六二九年出兵打败突厥，巩固了当时的北部边防并开辟了通往中亚西亚的商路。唐时的大海船，曾远航波斯湾。唐人杜环，七五一年（唐天宝十年）到过地中海，七六

二年(宝应元年)随商船回国，曾经在阿拉伯(大食)看到有中国人做绫绢机织等工匠。中国人民和阿拉伯人民长期以来的友好贸易往来，从唐代就已开始了。

到了宋朝，整个地主阶级已经走向没落反动，儒家学说成为地主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法家思想越来越被排挤打击。北宋中期，各种矛盾日益尖锐化，国家积贫积弱，民族危机严重。顽固派为了对付这种局面，主张“屈己增币”，要用更多的金钱物资向入侵者进贡，恬不知耻地称为这是什么“岁赐”、“岁纳”。说这样一来，敌人就不会“兴兵犯塞，以困生民”，宣扬投降有理的卖国哲学。被列宁称为“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王安石力倡变法，反对妥协投降的路线，向皇帝表示：“……岁与数十万钱帛，此乃臣之所耻”。他竭力推行富国强兵的路线，并曾取得一定成效。王安石的变法结果失败了，屈辱求和、妥协退让的路线占了上风，最后导致了北宋的灭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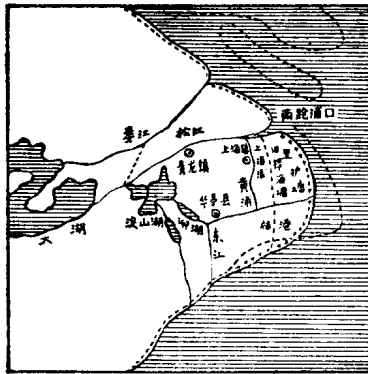
正是在北宋灭亡前后，上海开始成为一个对外贸易的城镇。这时，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十分尖锐，工商业新兴力量的出现使阶级矛盾更加复杂化，而这些又和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构成一个错综复杂的局面。

从滨海渔村到“海舶辐辏”的城镇

上海地处富饶的长江三角洲的东端，是一片辽阔的冲积平原。上海这个名称，还是在公元十一世纪北宋后期才有的，但是上海地区陆地的形成，历史非常久远。解放以后，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上海曾经发掘了多处

古文化遗址，出土了许多古代文物，证明上海地区的西部，即嘉定、青浦、松江、金山等县的大部分，在四、五千年以前已是陆地，劳动人民已经在这块土地上从事渔猎和农业。上海地区的东部，如市区和浦东，大约在公元十世纪中叶，即唐宋之间，也已形成了陆地。

上海在最早时期是一个滨海渔村。公元七四六年（唐天宝五年），在今青浦县的东北，有一个青龙镇，是我国东南地区的重要商业市镇，和国外已有贸易往来。公元七五一年（唐天宝十年），在今松江县地方设立了华亭县。宋初，在华亭东北建立了盐场。这时，青龙镇由于河道水流淤浅，大船出入不便，贸易日渐衰落，而华亭东北近海一带就成为海上交通的重要出入口，“人烟浩穰，海舶辐辏”，就是说已经成为闹市，海船聚集，贸易也相应地发展起来。一〇七四年（北宋熙宁七年），就把这里定名为上海镇，同时，还设立了



宋代的上海

专门管理对外贸易的市舶提举司和榷货场。到了一一〇七年(北宋大观元年)以后,原设在青龙镇的监镇理财官也移驻上海。一二六五年至一二六七年(南宋咸淳初年),就在今旧城区正式建立镇治,派有镇将。

宋代的市舶司,主要的职责是:管理船舶的进出登记,征收税品,收买船舶装来的货物,并把抽得的或买来的最珍贵的货物送呈宫廷皇室。它不仅类似后来的海关和港口管理机构,而且还是一个对外贸易部门。上海一开始设镇,就建立了市舶司,可见当时进出船舶已经相当频繁,对外贸易也已经相当兴盛。

宋代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相互交织,主要矛盾仍然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北宋王朝建立不久,就出现内政腐败、外患严重的现象。北宋中期,上层官僚地主集团肆意兼并土地,赋役繁重,激起了十一世纪四十年代一系列的农民起义。对外,民族矛盾更加尖锐,战争和屈辱的“岁币”,都是宋王朝沉重的负担。封建国家赋税来源不断缩小,财政发生严重危机。统治阶级除了加紧向人民压榨搜括以外,还把“市舶之利”作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当时的市舶收入,北宋时一般征收输入品的十分之一,有时则征收十分之二。到了一一四四年(南宋绍兴十四年),曾因国库匮乏而加重税率,不论粗细物品,一律征收十分之四。

北宋时期,北方的陆路贸易,由于和战不定,时通时罢,很不正常,而南方的海上贸易却得到了发展。宋代的市舶司,除广州外,还在杭州、明州(浙江宁波)、泉州(福建泉州)设司。此外,还曾在温州、澈浦(浙江海盐)、秀州(浙江嘉

兴)、江阴、密州(山东胶县)等地先后设置市舶司、市舶务或市舶场。上海设立市舶司也在这一时期。南宋政权建立后,财源枯竭,统治阶级为了维持他们奢侈腐化的生活,搜求“金银香药犀象百货”等“四海之珍奇”,因而极力奖励发展对外贸易。宋高宗赵构在一一三七年(绍兴七年)曾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一一四六年(绍兴十六年)又说:“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那时市舶岁入已占财政总收入的二十分之一。当时南宋定都临安(杭州),这里是纸醉金迷,贸易昼夜不绝的地方,形成畸形繁荣。围绕着临安,又发展起许多新的市镇。泉州在南宋末年已成为对外贸易的最大商港。上海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

南宋曾与五十余国通商,东至朝鲜、日本,南至南洋、印度,西至波斯、阿拉伯等国。输出商品主要是瓷器、绢帛、樟脑、大黄、铁器等,其中以瓷器、帛为最多。输入商品主要是香料、珊瑚、象牙、宝石、玛瑙等统治阶级需要的奢侈品。中国的铜钱也大量传到国外。一八八八年在今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一八九八年在今索马里的摩加迪沙,都曾掘得宋代古钱。东非海岸许多地方也发现过宋代的瓷器碎片。当时,既有外国商人前来贸易,也有中国商船出海,大食、波斯等国商人也有乘中国海船前来我国。宋时,上海的黄浦江还没有形成。那时的吴淞江(即苏州河)叫松江,有一条支流,大约在今外滩以东的黄浦江中,叫上海浦,沿海商船就从这里进出。上海在东南一带的经济地位日益提高。

“人间正道是沧桑”。上海从渔村发展到城镇，是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的结果。正如恩格斯所说：“地球的表面、气候、植物界、动物界以及人类本身都不断地变化，而且这一切都是由于人的活动”（《自然辩证法》）。人的活动还在继续下去，自然界和人类本身也在不断地起着变化。

宋代以后到鸦片战争前夕的上海对外贸易

上海自宋代，特别是南宋以后，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对外贸易的城镇。从元代、明代、直至清代鸦片战争以前，上海的对外贸易仍然继续有所发展，但经历了一个由盛而衰，再由衰而盛的曲折迂回的过程。

元代交通比较发达，对促进国内外经济文化交流起了一定作用。对外的陆路贸易，天山南北二路商道重行开通，海上贸易，也采取鼓励发展的政策。元代承宋旧制，在泉州、上海、澈浦、温州、庆元（宁波）、广州、杭州设市舶司七处，其中上海市舶司在一二七七年（元至元十四年）设立。由于上海“市易日盛”、“户口繁多”、“民物富庶”，一二九二年（至元二十九年），就“割华亭东北五乡，立县于镇，隶松江府。”^①这时的上海县区，包括今天的市区和上海、青浦、南汇、川沙四县，松江也改名为吴淞江。随着上海及附近地区农业、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和商品交换的发展，上海的对外贸易就具有更加良好的基础了。

十三世纪末（元成宗时），曾把上海、澈浦并入庆元市舶司，又在太仓贸易，舶商常来互市。当时泉州的贸易相当

^① 《弘治上海志》。

兴盛，港口船舶，大的约有一百，小的不可胜数。元代对市舶司的管理制度，曾进一步加以详细规定。一二九三年（至元三十年），制定《市舶抽分则例》二十二条。^①十四世纪中叶（元末至正年间），上海县已有一批专为对外贸易服务的“海船舶商梢水”人员，共五千六百余人，当时上海全县才七万多户，可见进出海船的繁忙。元代对外贸易主要由朝廷经营，官府往往自备海船，选取商人往海外贸易，所获利益，商人得三分，官府得七分。输入多为珍宝、香料等奢侈品，供皇室贵族享用，输出主要是手工业品，还有金、银、铜钱、铁货。这时，上海海上运输和贸易的规模，比南宋时代又有了一些发展。

明王朝初期，由于政权还不稳定，社会经济还没有恢复，沿海各地，出现了倭寇的劫掠和骚扰。于是，明王朝严格实行“海禁”，“片板不准下海”，申令民间禁用海外各种产物。当时，西北的陆路贸易已经衰落，东南的海上贸易也转为停滞。上海的市舶司也被撤销，后来太仓、黄渡虽曾经设司，但不久也取消了。

明初虽然坚决禁止私人下海通商，但却允许外国“贡船”在政府的严格控制下前来贸易，期限定为三年一次或五年一次；路程限取道广州、泉州、宁波；来船数目和随从人数也有规定。上海这时既不是市舶司的所在地，又不是规定“贡船”入境的港口，私人海上贸易又被严禁，对外贸易本应陷于完全停顿，然而，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由于在宋、元两代，上海已经和国外建立了贸易关系，当时社会经济的

^① 见《元史·食货志》。“市舶抽分”，就是对进出口船舶征税的意思。